

国际移民对母国经济的影响

——基于汇款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王颖,姚宝珍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移民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人口流动现象,对母国(移民输出国)经济会产生重要影响。基于对乐观主义学派和悲观主义学派观点之争的回顾,分析认为观点差异可能源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实背景差异。采用164个国家跨国移民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进行分组实证分析,验证了悲观主义学派的观点,并考察了移民通过汇款对母国经济发展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移民通过个人汇款对母国经济发展产生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但难以抵消移民外迁带来的负面影响;当母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移民的负面效应更为显著。与此同时,移民会加剧高收入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以及低收入国家的通货膨胀率。

关键词 国际移民;母国经济;移民汇款;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 F83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72X(2021)01-0023-09

DOI:10.16011/j.cnki.jjw.2021.01.004

移民是自人类出现以来始终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种迁徙现象,移民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大约250万年前的东非,祖先为“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1]。200多万年的今天,移民已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种人口流动现象,关乎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因素,伴随商品流、资本流、技术流、知识流、信息流等在空间上的复杂交织与流变,而历史上古希腊殖民运动、古罗马扩张、欧洲殖民地繁荣,以及美国崛起等,都与大规模移民密不可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移民的直接后果。进入21世纪后,相比历史上的维京殖民者、西非奴隶、印度劳工,国际移民的规模更大、因由更复杂、维度更多变、构成更多样、界限也更模糊。如此,移民对其母国的经济发展也就会产生更多复杂的影响。

一、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按照联合国定义,移民是指任何一个正在跨越或已经跨越国际边界的人,或任何离开其常住地的人,无论此人的法律地位、迁徙是自愿或非自愿、迁徙出于什么原因,或停留时间长短^①。根据该界定,国际移民概念的核心是改变常住国,也就是通常每日作息所在的国家,而以旅游、度假、探亲访友、商

业、医疗或宗教朝圣为目的的临时出国旅行,不会改变一个人的常住国^②。因此,移民研究包含其空间和时间属性。按照帕特里·曼宁的概念性界定^③,移民包括殖民化、城市化过程中的移民活动,以及发生在流散地、中转站和最终定居点的一系列行为^[2]。国际移民相关理论研究是不同层次上的过程性研究,比如移民源起、移民流动方向性和连续性、移民经济结果、移民劳动力利用、移民社会文化适应等^[3]。

过去几十年以来,移民对母国和东道国发展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热点,相较而言,人们更愿意从东道国角度探讨移民决策的原因和影响,也就是移民作为结果的行动层面。而被忽略的是,这些影响移民的因素也可能对母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4],学术界并未就此提供深入见解。De

①联合国网站.移民[EB/OL].<https://www.un.org/zh/sections/issues-depth/migration/index.html>,2019-08-19.

②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2010年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第140页《联合国国际移民统计建议》的修订中对国际移民的定义进行了界定。

③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移民概念更倾向于个体具体行动层面,而非概括性界定。实际上,国际移民具有一定过程性特征,包含其本身内在状态与变化,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远非止于作为结果的行动层面。

收稿日期:2020-08-14

作者简介:王颖,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行为学、劳动经济学及人口经济学;姚宝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本及制度环境研究。

Haas把移民对母国的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分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派,他认为两大学派分歧反映了社会理论和发展理论更深层次的范式分歧,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自由主义和国家中间派观点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5]。

(一)乐观主义:“移民—发展”

乐观主义学派以功能主义(Functionalist)为核心要义,植根于欧洲向北美移民的历史经验,反映了二战后占主导地位的发展主义观点,主要包括新古典移民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推拉理论^[6]。乐观主义学派认为移民是一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形式,不仅能够为母国带来金钱,也会带来新思想、新技术、新知识等,能够推动母国的变革和创新进程,对母国发展发挥积极作用^[7]。Beijer认为,国际移民对其母国来说代表着工业发展的希望,许多非熟练移民回国后被新的技术短缺行业吸引,而另一些人则利用他们的储蓄以雇主身份开始,并在他们的农村工业中引进新的工业方式^[8]。更多学者认为,熟练劳动力的转移也可能是益的^[9]。也有学者从经验层面验证了移民对母国的积极影响,但其并不完全是积极的^[10]。移民最初可能对其母国而言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人才流失,但这种人才流失在长期被认为可以为母国带来知识、商业资源、技术等直接或间接的益处,并且返回的移民能够带来更多国际人力资本,为其母国建立国际知识网络^[11],移民、贸易、投资和发展合作等相关政策的一致性可以增加这些收益。Agunias认为,尽管对不平等、经济增长、汇率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或许不足,但总体而言,这种影响是积极的^[12]。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移民对母国经济的影响显得更为积极,移民使消费、福利在国内生产基础上达到了更高水准,甚至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之一,排挤移民汇款权利的影响将是可悲的。

(二)悲观主义:“移民—衰退”

悲观主义学派以结构主义(Structuralist)为核心要义,彻底推翻了乐观主义学派的观点,认为移民是全球资本扩张造成的“逃难”,移民会加重母国欠发达问题,扩大发展差距^[5]。与此同时,在悲观主义学派看来,移民会导致输出国熟练和专业劳动力的外流,而移民所带来的汇款对经济的正面效应不足以抵充人才外流所导致的负面效应。McKee和Tisdell提出移民的主力是技术熟练劳动力,对于吸收国内剩余劳动力并没有多大作用,反而会对其发

展产生阻碍^[13]。

实际上,悲观主义学派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伴随对历史功能主义的批判而诞生,移民将直接加剧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平等,产生不对称增长,这与新古典均衡模型所提出的要素均等化是不同的^[5]。人们对于移民的悲观看法更多关注于可能产生的人才外流、不平等加剧、汇款依赖性、移民增多、通货膨胀以及非理性消费。Reichert将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称为“移民综合征”^[14]。Gabszewicz和Zanaj的经验证据表明,不论是在灵活的工资方案下,还是刚性的工资方案下,移民总是会损害原籍国的福利、改善目的国的福利^[15]。Rubenstein认为不平等促使村民从农村向城市移民,而移民、汇款和返回移民反过来又加剧了人际关系和家庭间的不平等^[16]。Jones认为移民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存在阶段性特征,随着移民经验的不断丰富,家庭间的不平等首先会降低,然后增加,但整个过程中,农村收入相对城市收入有所改善,因为汇款的对象主要是农村地区^[17]。

(三)理论反思:“背景—差异”

即便是移民对经济的正面影响得到了承认,但不可否认的是,移民并非替代经济政策的良方。McKee和Tisdell认为,可行的方案是以合作、国际服务联系或出口资本替代移民,比如通过各种经济救济的方式为贫困国家的福祉做贡献,而非引进贫困国家的人口^[13]。这比依赖移民促进母国经济发展更为有效。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对移民管理得当,无论是母国还是东道国都会从中受益,这将有益于解决学派之间的争论^[18]。整体来看,历史背景的差异性造就了两派观点的差异性。一些国家作为移民输出国(母国)并没有如期受益,欧洲各国间工资和福利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但却没有产生大规模的人口迁移。Nicolae和Bridusa认为,移民只能获得短期收益,但长期来看经济仍然会拉大差距,除非移民输出国能够补充劳动力^[19]。因而乐观主义学派的观点并未得到大规模的验证。悲观主义学派关注整体得失而忽略了不同国家的异质性,也无法就移民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作出理论解释。悲观主义学派“移民→不平等→更多移民”的逻辑存在本质冲突,“移民→不平等”的逻辑在于富裕群体的移民加剧了社会不平等,隐含财富与移民输出之间的正向关系,而“不平等→更多移民”的逻辑在于财富与移民输出之间的负向关系,即不平等的加

剧导致更多贫困人口移民^[5]。

De Haas 指出,移民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之所以存在分歧,是因为不同国家在移民政策、汇款权利、家庭收入等方面的差异构建了移民发展的不同空间,移民汇款的投资程度、投资方向、投资地点等的不同也对经济产生了不同影响^[5]。因此,移民的积极影响有限,移民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需要从不同层次上展开分析。对两大理论学派的反思引出对更多经验证据的需要,而囿于数据获取困难的现实,相关研究多见于理论探讨。经验证据大多在微观个体层面讨论移民成因,研究边界则更多限于移民与东道国之间的经济联系。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关于两大学派争论的理论反思,并以国际数据为基础对两派学者的观点进行分组、定量化验证。与此同时,移民汇款作为移民与母国之间经济互动的渠道,本文拟就该路径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反映汇款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采用分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不仅是理论讨论的需要,也是现实所需,忽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背景因素对移民的经济效应进行讨论并不具有普适意义,分情况讨论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移民政策的研究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二、模型、变量及数据

(一)样本及模型

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采取1995—2015年^④164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由于联合国移民数据以5年为间隔,故本文研究以5年为间隔构建短面板数据,共包含1990、1995、2000、2005、2010、2015等6个时期。图1为中介效应模型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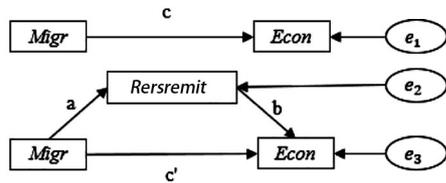


图1 中介效应模型

$$Econ=cMigr+e_1 \quad (1)$$

$$Persremitt=aMigr+e_2 \quad (2)$$

$$Econ=c'migr + bPersremitt + e_3 \quad (3)$$

其中,解释变量为Migr,被解释变量为Econ,中介变量为Persremitt。方程(1)系数c是Migr对Econ的总效应;方程(2)系数a是Migr对Persremitt的效应;方程(3)系数b是控制了Migr后Persremitt对

Econ的效应,c'是控制Persremitt的影响后Migr对Econ的直接影响; e_1 、 e_2 、 e_3 分别为回归残差^[20]。其中: $c=c'+ab$,若c显著,a、b均显著,则中介效应显著。

由于经济发展影响因素众多,故模型应加入控制变量,避免因遗漏变量产生内生性问题。本文首先对模型分别进行了个体效应、时间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结果强烈拒绝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为0的假设,且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明显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故此,本文构建基于双向固定效应的中介效应模型,具体如下:

$$\begin{aligned} \ln GDPP_{it} = & \alpha_0 + \alpha_1 \ln Migr_{it} + \alpha_2 \ln C_{it} + \\ & \alpha_3 \ln Hc_{it} + \alpha_4 \ln Ctfp_{it} + \alpha_5 \ln Cshi_{it} + \alpha_6 \ln Cshg_{it} + \\ & \alpha_7 \ln Score_{it} + \alpha_8 \ln Td_{it} + \alpha_9 \ln c_1 + \alpha_{10} \ln c_2 + \\ & \alpha_{11} \ln c_3 + \alpha_{12} Year_{1990} + \alpha_{13} Year_{1995} + \alpha_{14} Year_{2000} + \\ & \alpha_{15} Year_{2005} + \alpha_{16} Year_{2010} + \varepsilon_i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4)$$

$$\begin{aligned} \ln Persremitt_{it} = & \beta_0 + \beta_1 \ln Migr_{it} + \beta_2 \ln C_{it} + \\ & \beta_3 \ln Hc_{it} + \beta_4 \ln Ctfp_{it} + \beta_5 \ln Cshi_{it} + \beta_6 \ln Cshg_{it} + \\ & \beta_7 \ln Score_{it} + \beta_8 \ln Td_{it} + \beta_9 \ln c_1 + \beta_{10} \ln c_2 + \beta_{11} \ln c_3 + \\ & \beta_{12} Year_{1990} + \beta_{13} Year_{1995} + \beta_{14} Year_{2000} + \beta_{15} Year_{2005} + \\ & \beta_{16} Year_{2010} + u_i + u_{it} \end{aligned} \quad (5)$$

$$\begin{aligned} \ln GDPP_{it} = & \gamma_0 + \gamma_1 \ln Persremitt_{it} + \gamma_2 \ln Migr_{it} + \\ & \gamma_3 \ln C_{it} + \gamma_4 \ln Hc_{it} + \gamma_5 \ln Ctfp_{it} + \gamma_6 \ln Cshi_{it} + \\ & \gamma_7 \ln Cshg_{it} + \gamma_8 \ln Score_{it} + \gamma_9 \ln Td_{it} + \gamma_{10} \ln c_1 + \\ & \gamma_{11} \ln c_2 + \gamma_{12} \ln c_3 + \gamma_{13} Year_{1990} + \gamma_{14} Year_{1995} + \\ & \gamma_{15} Year_{2000} + \gamma_{16} Year_{2005} + \gamma_{17} Year_{2010} + \mu_i + \mu_{it} \end{aligned} \quad (6)$$

其中,下标*i*表示国家和地区,*t*表示时期, ε_i 、 u_i 、 μ_i 为不可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家和地区固定效应,Year₁₉₉₀、Year₁₉₉₅、Year₂₀₀₀、Year₂₀₀₅、Year₂₀₁₀是以虚拟变量表示时间固定效应;lnc₁、lnc₂、lnc₃分别为高收入组、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虚拟变量。模型核心变量为被解释变量GDPP、中介变量Persremitt及解释变量Migr,其中 α_1 、 β_1 、 γ_1 、 γ_2 是本文最为关心的估计系数。如存在中介效应,则 α_1 、 β_1 、 γ_1 、 γ_2 均需显著。控制变量分别为:C、Hc、Cshi、Cshg、Td、Score。为检验移民对经济发展其他方面的影响,本研究还将针对移民对收入不平等、贫困及通货膨胀的影响进行检验。变量及英文简写详见表1。

(二)数据说明

因变量:人均GDP(GDPP),以2011年为基期,采用按美元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数据,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实现人均GDP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合

^④该数据目前仅公布至2015年。

表 1 变量全称及数据来源

变量	英文全称	中文释义	计量单位	数据来源
<i>GDPP</i>	GDP per capita, PPP (constant 2011 international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2011年不变)	美元	World Bank 数据库
<i>Persremit</i>	Personal remittances, received (2011 PPP)	接收的个人汇款(2011年购买力平价)	百万美元	World Bank 数据库据 PPP 转换因子计算
<i>Migr</i>	Total migrant stock at mid-year by origin	按来源国划分的年中移民存量	人	UN database 计算
<i>C</i>	Capital stock at constant 2011 national prices (in mil. 2011US\$)	资本存量(2011年全国价格,2011年百万美元计)	美元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9.1
<i>Hc</i>	Human Capital	人力资本存量	—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9.1
<i>Ctfp</i>	TFP level at current PPPs (USA=1)	现价生产力水平(美国=1)	—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9.1
<i>Cshi</i>	Share of gross capital formation at current PPPs	资本形成总额占比(现价)	%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9.1
<i>Cshg</i>	Share of government consumption at current PPPs	政府消费占比(现价)	%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9.1
<i>Score</i>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世界经济自由指数	—	Fraser Institute 数据库
<i>Td</i>	Trade Balance(% of GDP)	贸易差额占 GDP 比重	%	World Bank 数据库
<i>XR</i>	Exchange rate, national currency/USD (market+estimated)	汇率,本币/美元(市场+预估)	—	World Bank 数据库
<i>R</i>	Real interest rate (%)	实际利率	%	World Bank 数据库
<i>HDI</i>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人类发展指数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理比较。

核心解释变量:按来源国划分的年中移民存量(*Migr*),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移民数据计算,是当年来源为某一国家或地区但居住于其他国家的所有移民数量的总和,对于存在缺失值的按默认为0处理。

中介变量:接收的个人汇款(*Persremit*)。个人汇款由个人转账^⑤和雇员补偿^⑥组成。汇款通常包括正式渠道和许多非正式渠道,如现金、跨境货物等,由于难以获得非正式汇款交易数据,且正式汇款交易数据也因来源和估计方法不同而具有异构性,但这仍然是目前研究中最为广泛使用的数据。

控制变量:(1)资本(*C*),根据设施和设备投资计算的资本存量。(2)人力资本(*Hc*),根据 Barro 和 Lee 数据库与 CLS 数据库综合进行比对后构建的基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人力资本指数。(3)资本形成总额占比(*Cshi*),可用于比较不同地区资本形成效率,而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1]⑦}。(4)政府消费占比(*Cshg*),用于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政府消费规模,规模越大越容易对私人部分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22]。(5)制度(*Score*),采用 Fraser Institute 数据库世界经济自由指数衡量,国际上普遍采用该指标进行跨国制度比较研究。(6)贸易差额(*Td*),各国政府普遍强调国际收支贸易顺差,从而为本国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动力^[23]。

(三)统计事实

表 2 给出了本文所涉变量的统计描述。其中

人均 GDP 观察值 939 个,最大值 119973.600 美元,最小值 380.088 美元;基尼系数经补充缺失值后观察值共 455 个,其中南非在 2005 年高达 72,处于收入严重不平等阶段,财富分化现象严重;而基尼系数最小的国家则是 1990 年的斯洛伐克,仅为 18;移民数量观察值 984 个,数量最高的是 2015 年的印度,生活在出生国以外的移民数量高达 1586 万人;而移民数量最少的为英属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2000 年移民数量为 759 人。

表 2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观测数	平均值	计量单位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i>GDPP</i>	939	15267.140	美元	9308.626	119973.600	380.088	16999.120
<i>GINI</i>	455	37.508	—	35.000	72.000	18.000	10.250
<i>LPovR</i>	293	11.173	%	2.900	86.000	0.000	18.237
<i>MPovR</i>	293	22.012	%	11.500	96.200	0.000	26.566
<i>HPovR</i>	293	36.213	%	29.400	99.4.00	0.000	33.387
<i>Inf</i>	803	31.124	%	4.117	7481.664	-30.856	303.381
<i>Persremit</i>	827	64663.4	百万美元	6.85e+07	4.96e+13	269.2	1.73e+12
<i>Migr</i>	984	1019915	人	494281	1.59e+07	759	1741360
<i>C</i>	972	1714248.0	美元	185659.2	7.97e+07	163.0	5462302.0
<i>Hc</i>	822	2.371	—	2.398	3.742	1.030	0.705
<i>Cshi</i>	978	0.215	%	0.208	0.945	0.021	0.100
<i>Cshg</i>	978	0.197	%	0.177	1.330	0.086	0.104
<i>Score</i>	746	6.456	—	6.630	9.110	2.660	1.182
<i>Td</i>	890	81.564	%	71.769	416.390	0.021	47.361

图 2、图 3 分别显示了移民人口总量和个人汇款总量变化趋势。

⑤个人转账是非居民家庭向居民家庭转账的所有现金或事物。

⑥雇员补偿是指居民在非居民经济中从边境就业、季节性就业和其他短期就业获得的收入。

⑦据王绍光、胡鞍钢、王小鲁等学者的测算,中国的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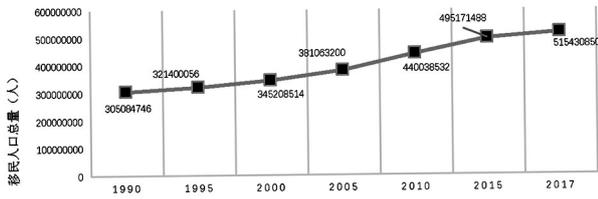


图2 全世界生活在出生国以外国家的移民人口总量(人)

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司。

1990—2017年,生活在出生国以外国家的移民人口总量从3.05亿增长为5.15亿,增长幅度高达68.95%,2017年占全球人口6.86%;按现价美元计算,全球各国接收的个人汇款总额从1990年684.41亿美元增长为2018年的6393.26亿美元,占GDP比重从40.32%增长到75.78%,分别增长8.34倍、0.88倍。其中发展中国家是移民的主要来源,高达八成以上(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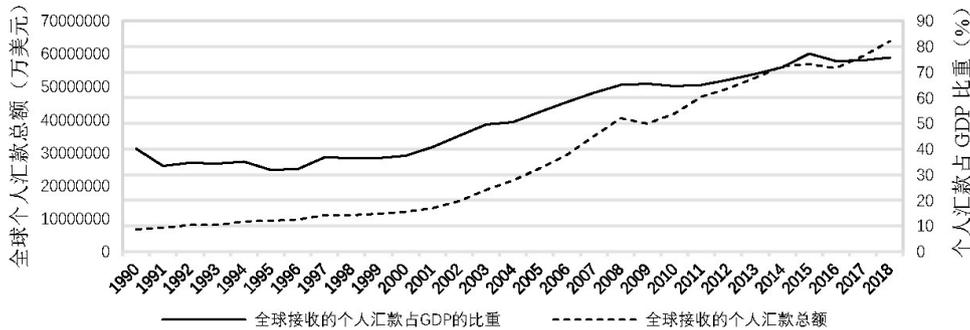


图3 1990-2018全球个人汇款总额(个人转账+雇员补偿)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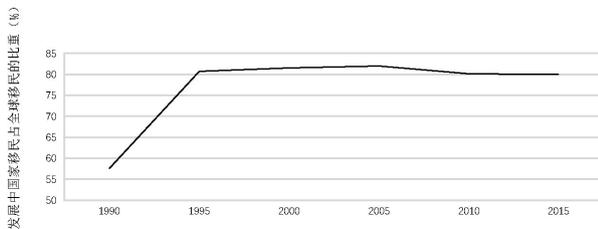


图4 1990-2015发展中国家移民占全球移民数量占比

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司。

三、估计结果

(一)移民对经济发展的中介效应

由于各变量存在不同量纲,且差别较大,在进行回归分析前,本研究对所有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使不同变量具有相同尺度。对面板数据进行怀特检验后发现数据存在异方差,再次使用BP检验进行确认,BP检验与怀特检验结果一致。对于存在异方差的数据,宜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广义最小二乘法通过变量转换使转换后的模型满足球形扰动项假设^[24]。由于本研究所采用数据为短面板,短面板数据可忽略自相关问题。本文所有实证分析由stata15软件完成。

控制国家(地区)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观察变量显著性和系数变化。表3所列估计结果显示,模型(1)、(3)、(4)、(6)、(7)、(9)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移民对经济发展的确存

在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综合来看呈负面效应,经济发展长期来看受到的负面冲击将多于正面冲击,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悲观主义学派的观点。移民外迁的负面经济效应可能出现的原因是多样的,如熟练劳动力外流、收入不平等加剧、汇款流入导致的汇率上升、移民汇款导致的家庭成员工作积极性降低、输出国工资上涨压力、劳动税收收入降低等,但究竟哪种渠道是导致负面效应出现的首要因素,还需更深入的理论讨论及实证检验。表3显示,收入分组虚拟变量强烈显著,说明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移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不同。为此,本研究根据人均收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分组回归(见表4)。结果显示,高收入国家的负面效应更为强烈和显著。移民数量每增加1%将引起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水平降低0.274%,而这一比例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分别为0.033%、0.092%、0.099%。高收入国家因专业劳动力外流而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一数据初步验证了De Haas的观点,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背景因素差异可能造成移民对经济的不同影响,因而根据国家和地区分情况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显得尤为必要。

为节省篇幅,表3及表4仅展示含全部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观察

移民汇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移民汇款对经济发展确实存在显著正向的影响,逐步回归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移民数量与移民汇款之间的关系也显然存在正向联系,逐步回归同样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移民数量每增加1%将引起移民汇款增加至少0.841%。但从分组回归结果(见表4)来看,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通过1%显著性检验,移民每增加1%都将引起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增长0.032%,引起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增长0.035%。但移民汇款对中高收入国家却显示出负面影响,对中低收入国家并无显著性影响。移民汇款对中高收入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其可能的原因是汇款流入所导致的汇率升值和劳动力供应降低。对于部分家庭而言,移民汇款的增多可能导致部分家庭成员选择不再从事劳动,而以汇款

作为生活来源。对低收入国家而言,由于其本身收入水平所限,移民汇款可能通过物质条件改善提高家庭福祉,但移民汇款无法充沛到足以让家庭成员放弃从事劳动。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移民汇款用于物质消费的比例相对可能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更多的汇款可能通过扩大投资促进生产力的提升。因而,汇款用途的差异性可能导致了一定程度上汇款对母国经济发展的刺激不同。

最后观察移民通过汇款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见表4)。实证结果显示,移民通过汇款这一中介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间接效应是正面的,虽然移民对于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不利,但移民向母国的汇款却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这种负面效应。为观察不同国家可能因背景差异所造成的差异性,通过分组样本中介效应模型回归显示:对于高收入国家

表3 广义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变量	(1) lnGDPP	(2) lnPersremit	(3) lnGDPP	(4) lnGDPP	(5) lnPersremit	(6) lnGDPP	(7) lnGDPP	(8) lnPersremit	(9) lnGDPP
lnPersremit			0.0075* (0.0040)			0.0150*** (0.0042)			0.0136*** (0.0041)
lnMigr	-0.159*** (0.0113)	0.841*** (0.0487)	-0.154*** (0.0116)	-0.135*** (0.0122)	1.037*** (0.0496)	-0.140*** (0.0131)	-0.132*** (0.0117)	1.034*** (0.0497)	-0.136*** (0.0126)
地区控制变量	显著								
时间控制变量	显著								
常数项	-1.787*** (0.0723)	-9.871*** (0.3890)	-1.569*** (0.0827)	-1.743*** (0.0763)	-7.930*** (0.3770)	-1.556*** (0.0893)	-1.455*** (0.0850)	-7.230*** (0.4100)	-1.355*** (0.0958)
观察值	785	714	713	703	656	656	682	638	638
国家数量	136	136	136	132	131	131	129	128	128

注:括号中的标准误***p<0.01,**p<0.05,*p<0.1。表4同。

表4 按收入分组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高收入国家			中高收入国家		
	(1) lnGDPP	(2) lnPersremit	(3) lnGDPP	(4) lnGDPP	(5) lnPersremit	(6) lnGDPP
lnPersremit			0.0318*** (0.0041)			-0.0143*** (0.0039)
lnMigr	-0.295*** (0.0123)	0.892*** (0.107)	-0.274*** (0.0135)	-0.057*** (0.0147)	0.939*** (0.1350)	-0.033** (0.0130)
地区虚拟变量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时间虚拟变量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常数项	-1.659*** (0.1420)	-5.730*** (1.3020)	-1.501*** (0.1280)	-1.303*** (0.1070)	-5.671*** (1.1250)	-1.441*** (0.1190)
观察值	193	183	183	138	134	134
国家数量	43	43	43	49	49	49
变量	中低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7) lnGDPP	(8) lnPersremit	(9) lnGDPP	(10) lnGDPP	(11) lnPersremit	(12) lnGDPP
lnPersremit			0.0020 (0.0055)			0.0349*** (0.0095)
lnMigr	-0.0933*** (0.019)	1.225*** (0.1010)	-0.092*** (0.0201)	-0.063** (0.0287)	1.294*** (0.0901)	-0.099*** (0.0334)
地区虚拟变量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时间虚拟变量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常数项	-1.981*** (0.1540)	-9.368*** (0.9800)	-2.087*** (0.1530)	-2.680*** (0.2020)	-6.176*** (0.6160)	-2.411*** (0.2170)
观察值	191	180	180	160	141	141
常数项	69	67	67	46	45	45

和低收入国家而言,移民的中介直接效应虽然为负,但通过汇款这一中介路径的间接效应分别为 0.892×0.0318 、 1.294×0.0349 。这意味着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移民输出通过向母国汇款的方式中和了移民输出的负面影响。对于中高收入国家而言,移民通过汇款的中介效应却显著为负,主要是移民汇款抑制了经济增长,中介效应为 -0.0143×0.939 。依次检验结果显示,中低收入组移民汇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因此,中介效应不检验。为此,再次采取Sobel系数乘积检验观察其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见表5)。检验结果显示,中低收入组的中介效应仍然不显著,也就是说对于中低收入国家而言,汇款对母国经济增长的确无法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移民汇款无法中和移民输出的负面效应。

表5 中低收入组Sobel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Coef	Std Err	Z	P> Z
Sobel	0.005021	0.012638	0.397300	0.691127
Goodman-1	0.005021	0.012966	0.387300	0.698549
Goodman-2	0.005021	0.012302	0.408200	0.683130
系数a	1.375370	0.316611	4.344040	0.000014
系数b	0.003651	0.009150	0.398998	0.689895
间接效应	0.005021	0.012638	0.397326	0.691127
直接效应	-0.086686	0.039498	-2.194720	0.028184
总效应	-0.081665	0.037344	-2.186790	0.028758
总效应中被调节的百分比			-0.061489	
间接效应比总效应			-0.057927	

(二)移民对贫困、不平等和通货膨胀的影响

按照悲观主义学派的观点,移民不仅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和通货膨胀。乐观主义学派观点则认为移民有助于减贫。对此,本研究将一并进行检验,对移民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价。其中基尼系数(GINI),根据WIID(World Inequality Index Database)整理得到,由于该数据库为汇总数据库,为保证可比性,按照蓝嘉俊等提出的方法^[25]进行数据筛查^⑧。贫困发生率(LPovR、MPovR、HPovR),据国际贫困线计算的贫困人口占比,用于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贫困发生程度,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数据库;通货膨胀(Inf),根据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使用拉斯佩尔公式衡量,反映消费者平均每年购买一篮子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变化百分比,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数据库。

总样本检验结果显示,移民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且汇款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分组检验后,移民对高收入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产生了正的直接影响,对中高收入国家产生了负的直接影响。也就是说,高收入国家的移民输出越多将导致收入不平

等现象加剧,但中高收入国家的移民输出却能够缩短收入差距,起到减贫效应。从贫困发生率来看,以中等贫困线和高贫困线衡量的贫困发生率受移民数量的正影响,移民将加剧贫困的发生。其中,低收入国家的移民数量虽然对贫困发生率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但却通过移民汇款对贫困率的产生了负的间接影响。对通货膨胀的检验显示,移民与通货膨胀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但分组检验结果发现,低收入国家的移民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负的显著关联,通货膨胀率随移民的不断输出呈下降趋势,但这一影响并非通过个人汇款产生。

(三)稳健性讨论

本文多组回归结果均支持了移民的负面影响,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发现,参数估计结果逐步趋于稳定,说明控制变量的选取基本满足回归分析的需要,移民与母国经济发展之间的负面联系这一分析结果是稳健的。对于汇款的中介效应,本文采取Bootstrap法^⑨重复抽样1000次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6。

表6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Observed Coef.	Bootstrap Std. Err	Z	P> Z	Normal-based [95% Conf. Interval]	
总体样本						
间接效应	0.04100403	0.0101087	4.060	0.000	0.0211913	0.0608167
直接效应	-0.03565841	0.0286075	-12.46	0.000	-0.4126537	-0.3005145
高收入组						
间接效应	0.0226802	0.0093562	2.420	0.015	0.0043423	0.0410181
直接效应	-0.2896243	0.0226999	-12.76	0.000	-0.3341153	-0.2451333
中高收入组						
间接效应	-0.0193204	0.0106836	-1.81	0.071	-0.0402599	0.0016192
直接效应	-0.0430040	0.0278660	-1.54	0.123	-0.0976202	0.0116123
中低收入组						
间接效应	0.0050215	0.0145552	0.34	0.730	-0.0235062	0.0335491
直接效应	-0.0866860	0.0375486	-2.31	0.021	-0.1602798	-0.0130921
低收入组						
间接效应	0.0745698	0.0303140	2.46	0.014	0.0151554	0.1339842
直接效应	-0.1395551	0.0630670	-2.21	0.027	-0.2631640	-0.0159461

在依次加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发现,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与依次检验结果一致。按照收入分组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见表6),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及低收入国家的中介效应与依次检验结果在符号方向和显著性方面均保持一致,且中低收入国家的中介效应与Sobel检验结果一致,证明前

⑧优先选择覆盖全区域、基于个人和家庭的数据,在此基础上优先选择以可支配收入衡量且质量评估等级较高的数据,满足以上条件的,尽力确保每个国家各个年份数据在统计来源上的一致性。对于缺失数据,根据OECD iLibrary数据库、Povcal Net数据库、WDI数据库、IDD数据库等进行补充。

⑨Bootstrap作为一种非参统计方法,通过在给定的样本中进行数次重复取样产生新的样本,产生多少个样本就能得到多少个估计值,并且不对样本分布做要求。

文所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及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四、结论及讨论

本文通过164个国家面板数据就移民对母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讨与实证检验。数据分析表明,移民将对母国经济发展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而这一影响在高收入国家最为显著,其次是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实证结果并不支持乐观主义学派的观点,强烈印证了悲观主义学派对移民现象的讨论。尽管移民可能在短期内通过个人汇款对母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这一积极影响并不足以抵消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贝克尔和科伊尔在阐述“谁将被吸引而移民”这一问题时提出,由于移民的成本往往在两年内得以偿付,因此移民者更多是有熟练技能的人,他们比技能生疏的人在移民中能获得更多收益,因而吸引力也就更大。此外,能够被吸引的移民还包括那些有想法、有活力、希望日后生活条件改善的年轻人,以及那些对东道国做出承诺的人,他们将是那些最愿意支付高额移民费的人^[26]。因此,从劳动力流失的角度来看,熟练劳动力的流失短期内对母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但经过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熟练劳动力的外流将导致母国的就业市场结构产生变化,就业市场上那些有能力、并且有意愿改变家庭福祉的劳动力因外流被技能相对不成熟的劳动力所替代,劳动力技能水平的下降一定程度上通过对生产力水平和效率的影响,在长期内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效应。这一现象在高收入国家之所以表现更为明显,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检验结果显示,高收入国家的移民外迁现象显著加剧了不平等,而收入不平等可能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外流,从而削弱了本国的竞争力。对于中高收入国家而言,移民外迁会减少收入不平等,因而,相对高收入国家而言,移民的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的更多。

移民汇款总体来说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虽然这种作用可能只是短期现象,学界认为,移民汇款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在长期内将逐步减弱。这种积极的影响可能来自于多种原因:第一,移民汇款改善仍留在母国的家庭成员的福祉水平,使其家庭成员有能力产生更多的消费,从而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第二,移民汇款可能部分被用作生产性投资,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生产效率;第

三,移民汇款可能被用做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或技能水平,实现家庭人力资本积累。但移民汇款的使用也并非都是积极的,当汇款被更多用于消费支出(如购买食品、衣物等生活性支出,或休闲娱乐、婚丧嫁娶等享受型支出)而非生产性投资时,汇款的经济价值就被大大削弱了,对经济增长也就不再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中高收入国家之所以出现汇款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其最大可能的原因是消费型支出过多所导致的负面经济效应超过了正面经济效应。

移民与母国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更深层次的讨论和验证,本研究局限在于仅探讨了移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移民汇款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验证了悲观主义学派的观点,但未能在更广泛层面上就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而这一复杂过程还需从因果关系、传导机制、影响因素等多个层面进行深入分析才能构建更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而这也正是未来学界需要继续探索的领域。

参考文献:

- [1]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2]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历史上的移民[M].李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3]PORTES A. Immigration theory for a new century: Some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7, 31(4): 799-825.
- [4]TAYLOR E J.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ur migration and the role of remittances in the migration process[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1999, 37(1): 63-88.
- [5]DE HAAS H.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J].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10, 44(1): 227-264.
- [6]陈雪. 国外性别与移民研究的互动[J]. 妇女研究论丛, 2016(4): 120-128.
- [7]PENNINX R.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ase of Turkey[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82, 16(4): 781-818.
- [8]BEIJER G.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migratory movements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1970, 8(3): 93-109.
- [9]MOUNTFORD A, RAPOPORT H. The brain drain and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1, 95(1): 4-17.
- [10]Keely C B, Tran B N. Remittances from labor migration: Evaluations, performance and implications[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89, 23(3): 500-525.

- [11]GIBSON J, MCKENZIE D. Scientific mobility and knowledge networks in high emigration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the Pacific[J]. *Research Policy*, 2014, 43(9): 1486-1495.
- [12]AGUNIAS D R. Remittanc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mpacts, and policy option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R]. Washington DC: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06.
- [13]MCKEE D L, TISDELL C A. The developmental implications of migration from and between small island nations[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1988, 26(4): 417-426.
- [14]REICHERT J S. The migrant syndrome: Seasonal US wage labor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entral Mexico[J]. *Human Organization*, 1981, 40(1): 56-66.
- [15]GABSZEWICZ J, ZANAJ S. Migration: A theoretical comparison on countries' welfa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19, 16(2): 167-183.
- [16]RUBENSTEIN H.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remittances in rural Mexico[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Migraciones Internacionales*, 1992, 30(2): 127-53.
- [17]JONES R C.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A question of migration stage and geographic scale[J]. *Economic Geography*, 1998, 74(1): 8-25.
- [18]BARUCH Y, BUDHWAR P S, KHATRI N. Brain drain: Inclination to stay abroad after studies[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7, 42(1): 99-112.
- [19]NICOLAE M, BRIDUSA M R. Socio-economic effects of the labor force migration in an enlarged Europe [J]. *Journal for Economic Forecasting*, Institute for Economic Forecasting, 2007, 4(2): 44-56.
- [20]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5): 731-745.
- [21]赵娜, 张少辉. 中国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动态相关性: 基于协变模型的实证分析[J]. *财经研究*, 2007(8): 132-143.
- [22]杜焱. 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阈值效应[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4(8): 31-42.
- [23]李明武. 正确认识贸易差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 *管理世界*, 2004(5): 132-133.
- [24]陈强. 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 [25]蓝嘉俊, 魏下海, 吴超林. 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拉大还是缩小? 来自跨国数据(1970—2011年)的经验发现[J]. *人口研究*, 2014, 38(5): 87-106.
- [26]加里·贝克尔·戴安娜·科伊尔. 移民的挑战: 一个经济学的视角[M]. 徐春华,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Emigrat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ome Countrie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Mediating Effect of Personal Remittance

WANG Ying, YAO Bao-zhen

(School of Gover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Emigration is a noticeable phenomenon of world population flow during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which has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home country.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arguments between optimist and pessimist school on emigration's economic effect of the home countries, we propose that different viewpoints may originate from the different reality background. The paper uses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ata of 164 countries, and make a groupe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countries of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through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verifying views of the migration pessimism school and examin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migration's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home countries. The study has shown significant impact of emigrants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through personal remittances, but which is difficult to offse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migration to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home country develops more well,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migration are more significant. Also, emigration will increase income inequality of upper-middle income countries, but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of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nd inflation of low-income countrie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emigration; economy of home countries; migrant remittances; mediating effect

(责任编辑 张爱英)